

迎着新世纪的曙光

YINGZHEXINSHI
JIDESHUGUANG

党治国著

迎着新世纪的曙光

党治国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编辑校对: 李永泉

迎着新世纪的曙光

党治国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雁塔区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5 印张 125 千字

1992 年 8 月第一版 199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5419—3431—3 / F·48

定价: 4.8 元



作者像

雁子摄于 1992 年 3 月

序

何金铭

党治国的著作《迎着新世纪的曙光》，这本写于 1984 到 1989 年的经济理论研究文集，就要出版了。我为他祝贺。

党治国是个从坎坷道路上走过来的强者。1954 年他以陕西高考生的榜首荣幸地进入清华园，1957 年却在这座著名高等学府被错定为“右派”。之后做了十年矿工、两年农民，仍不能避免“文革”时的十年监牢生涯。所有这些，都未能使他停止学习和思考，更未能使他丢弃对于社会主义前途的追求。攻读《资本论》，倒是在十年监牢里进行的。许多在丧失自由情况下写的笔记、文章，居然署名为“共产主义者”。改革开放以来，他写了一系列经济理论研究成果，以其清新的文风和独到的见解，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了解了他人的人生经历并读了他的一些文章后，不由不想起毛泽东主席引用过的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文王拘而演周易”的一段话。挫折可以使人气馁，也可以使人愤发，这就要看当事者如何对待了。强者是现实的、乐观的，即在回顾过去，也是为着未来。新中国成立四十几年来，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实践，曲曲折折，风风雨雨，痛苦的教训是不少的。然而成就毕竟也是巨大的，即使失败的经验，也可以化为有益的东西。我们只能取在这个基础上冷静思考、深入研究、不断探索、不断前进的态度，而不能是相反。

有人说党治国是个“理论狂人”。这自然是褒，不是贬。只是

我在看了他这本著作后，倒觉得他是个头脑冷静的人，不存在字面意义上的那个“狂”，也不存在容易与之发生联想的“狂热”。如果说“狂”的褒义在于发常人之所未发，那么也须补充一点，这个“未发”也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普普通通的真理，而不是什么随心所欲、超出规律的怪东西。例如他写了这么一句话：经济规律的惩罚铁面无私而且从不平反。这话相当尖锐，但在有过实践经验而又老老实实承认事实的人看来，党治国治学态度的可贵，以及他的一些文章的可贵，在于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而同时具有明确的反对僵化、反对从本本到本本的特色。也正因为如此，读党治国的文章，觉得从观点到语言都是他自己的，不是简单地从那本书、那张报纸、那个文件上抄来的；虽然不能说篇篇都有创见，也不必讳言可能有某些不够细密确切之处，却的确有不少的新意，耐人咀嚼，发人深思。

有人说党治国文章中的观点具有明显的“超前性”。这也是褒，不是贬。这样的例证，在这部著作中可以找到不少。1984年，在《一个重要的经济规律》一文中，他剖析了“资本主义有过的，社会主义不能有”这种思想的荒谬性。1987年，在《艰巨的任务在于创新》一文中，他指出“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和“破就是立”这一命题的片面性。1988年，对企业领导在盈利情况下因人均拿了三千多元奖金而受到处分一事，他提出了异议。所有这些，今天或者较易为人们所普遍理解，以前可不尽然。象珠海式重奖的事，恐怕在几年前还不会有很多人能够料到。但“超前”决非超越规律，超前也是建立在对于实践经验的认认真真的研究上的。超前也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包括它所吸收和依据的先前的实践，以及在未来日子上的实践。还可以说，真正的科学意义上的超前，同科学的预见是一回事，或者类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就应当这样做。否则，理论将无从成为行动的指南。

1978年间开始的、针对“两个凡是”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为题的大讨论，冲开了长期以来“左”的错误的束缚，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准备，为实行改革开放、探索和走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准备。邓小平同志当时曾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个人讲的每一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这场大讨论深刻地告诉人们，我们务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宝库绝非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而一定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符合实际的新内容。邓小平同志后来说过：“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不久前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又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去闯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模式道路来，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取的正确方针。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意义重大深远，不可以忘记了。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路线，社会主义就是完全有希望的，中国的富强繁荣就是完全有希望的。学习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时，我有以上一些体会。现在就以这些作为党治国同志著作的序。

1992年7月13日

作者的话

1989年，我在《理论 信仰 现实》一书中系统地推出了关于所有制改革和共有制的理论后，不断有读者来访和来信。除了探讨问题，许多人渴望得到我的一些论文。这些文章虽然发表了好几年前，得到它们的读者仍兴趣盎然。读者的需要促使我下定了出版这个集子的决心。

论世的文章之不能速朽，实乃作者的一大悲哀。在集子出版之际，如果问我的希望，回答仍然是希望它们速朽，希望改革的汹涌大潮迅速使我的观点被无情地抛向过去，成为历史的陈迹。为纪念这些文章之即将成为过去，一律一字不更地保持发表或写作时的原貌，使读者从理论的穿透力后面还能看到历史的年代的痕迹。

我的理论研究始终围绕着所有制这一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三分之二国营企业亏损的现实和股份制试点中的“走穴”现象，说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问题如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我们所缺乏的不仅是物质财富，尤其是理论思维。而发展理论的艰巨性和迫切性则预示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将要出现新的大突破大发展。

鄙人有志于斯久矣！出版这个集子，实有弃筏登舟之意。但愿献给诸位看官的下一部著作，进入新的境界，显示另一番风光。

1992年6月

目 录

序	(1)
作者的话	(1)
一、艰巨的任务在于创新	(1)
二、论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	(12)
三、论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的统一	(26)
四、僵化的模式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	(48)
五、一个重要的经济规律	(56)
六、论“共有制”	(65)
七、关于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方案	(72)
八、论所有制和所有权	(84)
九、责任能力和承包制	(95)
十、社会主义股份制是通向共有制的过渡点	(101)
十一、经济规律在行动中	(109)
十二、关于债事银行的探索	(125)
十三、30 万与 3000 万	(133)
十四、附： 共同思考 别开生面	(146)

艰巨的任务在于创新

——论“立”与“破”的辩证法

哲学的特点，就在于研究一般人平时所自以为很熟悉的东西。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导言》

为了在原有的地基上兴建新屋，必须拆掉旧屋。从这个三岁小孩子也懂的常识出发，就得出了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的哲学命题，并进而推出“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破”就是“立”的结论。

这一类片面观点，在革命的破坏时期，反映了“矫枉必须过正”的客观要求。然而在革命的建设时期，这种“破”字当头的片面提法和“破”就是“立”的危险论点，就成为盲目行动的理论根据。际此社会主义各国进行改革的世界潮流，理清“立”与“破”的辩证关系，就具有非常迫切的意义了。

一、真理只有一个，错误的东西却有无数个

对于每一个具体的问题，真理只有一个。例如， $2+2$ 的正确答案就是一个 4。然而错误的答案却有无数个。仅仅指出 $2+2$ 不等于 5，不过是排除了无数个错误答案中的一个，不等于便找到了正确的答案。

当 $2+2=5$ 处于主导地位时，为了确立 $2+2=4$ ，必须否定 $2+2=5$ 。这时否定 $2+2=5$ 似乎便是发展真理的主要任务。进行这种否定的，除了主张 $2+2=4$ 的，还有主张 $2+2=3.5, 4.5, 6, 7, 8, \dots$ 的。其中主张 $2+2=3.5, 4.5$ 的，较之 $2+2=5$ ，向真理靠近了一步。但那主张 $2+2=6, 7, 8, \dots$ 的，却比原来的谬误离真理更远。只要否定 $2+2=5$ 的主导力量掌握着 $2+2=4$ 的真理，便不怕否定的力量中存在着谬误。真理不怕谬误。掌握着真理的人或社会力量是无畏的。

这只是一情况。

已知 $2+2=5$ 是错误的，却还不知那唯一正确的答案 $2+2=4$ 时，破除 $2+2=5$ ，就要采取比较谨慎和警惕的态度了。因为代替 $2+2=5$ 的，可能是 $2+2=4$ ，也可能是其他更错误的答案。在找到 $2+2=4$ 之前，用新的错误代替原有错误的可能性就比用真理代替谬误的可能性大得多，这时候再强调“破”字当头，就会加速错误互相替换的过程。错误越是林立，真理的出世就越是困难。

我们说不“破”不“立”是一个片面的真理，就是承认它在一定条件下是正确的，因而具有相对真理的性质。各种片面真理之总和及其联系，就是全面的真理。这里，我们主要不是研究不“破”不“立”的相对真理性，而是指出这个“真理”的片面性及其谬误。着重论证不“立”不“破”的道理和它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二、历史上几个“破”的例子

一只玻璃杯子是它的形状、尺寸、材料、图案、用途等等的组合，因而构成不同于其它事物的“它自己”。然而人类的长处和不幸就在于他们有抽象的能力。这只玻璃杯子可以被抽象成“玻璃器皿”，“一种几何造型”，“一种花纹图案”，“一件饮水器具”，“一

件工艺品”，“一件文物”等等。于是对它的“破”，可以反映为极不相同的观点。打碎这一只玻璃杯子，在抽象的思维里，便是打碎了几只杯子。有人认为“一只玻璃器皿打了”，有人认为“一件工艺品毁了”，有人认为“一件饮水器具破了”等等。

对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可以有多种看法。黑旋风李逵主张“杀上东京夺了鸟位”的目的，是要“晁盖哥哥便做了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宋皇帝，我们大家都做了将军。”方腊则要推翻宋室江山自立为天子。对一些历史学家来说，某一农民起义要推翻的是一个具体的封建王朝。对另一些历史学家来说，农民起义要推翻整个的封建制度，反的是封建主义。按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农民起义应推翻一般的人对人的政治统治。如果外星人研究地球人的历史，说不定会认为农民起义表现了人类不耐烦在自己的地球上生活。

由此可见，如果孤立地看待“破”，那是得不出什么结果来的。愤世嫉俗的青年发表激昂的否定现实的言论，但是提不出改革社会的方案。

事物只有在其“对方”身上才能显示出自己的面貌。对镜才能自视。男性的美存在于女性的审美观念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历史评价则是金兵作出的。同样，只有通过“立”，才能洞悉“破”的实质。

比如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究竟“破”什么，只要考察农民起义“立”了什么就清楚了。

不管农民起义曾用过什么口号，胜利的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无不是又一个封建王朝。建立新的封建王朝是农民起义的真正目的。

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存在着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当一个过程由许多必然阶段组成时，为了理解其中一个阶段，必须把它放在与其前后阶段的矛盾和联系中去研究。对于封建社会和封

建主义的认识，只有在资本主义出现后，才能上升为哲学。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文化成就，怎能认识封建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必然结局呢？认为“古今人一样反对封建社会，是从‘封建社会是一种坏的社会制度’这样一种观念得出的。这种观念什么都是，恰恰不是马克思主义。

在封建社会发展时期，农民起义是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其作用在于使封建社会从暂时的停滞走上继续发展的轨道。它是促进封建社会发展的，而不是反封建的。是用封建社会的发展反对封建社会的停滞；用封建的“圣主直臣”反对封建的昏君奸相。只有资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才有可能用民主主义否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前，农民起义即使把封建王朝“破”上一百次，也不会“立”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来。

在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初期，都存在着落后的汪洋大海的小生产。历史上小生产的解体是大商品生产促成的。落后的小农业变为先进的大农业是工业化的结果。商品生产和工业化的“立”，“破”了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认为不需要商品生产的充分发展，不需要凭借工业化，可以人为地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消灭小生产，已被实践所否定。联合起来的小生产不过是强化了的小生产。它不仅阻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使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应不足，而且束缚着人的发展和流动，从而延缓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否定商品经济表面上来自理论的错误，客观上却反映了封闭的小生产经济对开放的商品经济的否定。滑稽的是：号称“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以及他们的子弟却被迫大量下乡去接受小生产的“改造”或“再教育”。

运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化生产，是现代社会主义。运用落后的生产工具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进行集体生产，不过是历史上逝去了的原始共产主

义罢了。从原始共产主义不会直接产生出现代社会主义，而只会产生出新的奴隶制度来。多少社队干部成了社员头上的“主人”，难道仅仅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作怪”，而不是社会发展规律的重现吗？由此可见，从主观愿望出发的脱离客观必然性的“破”，只会徒然地增加历史的曲折。

最值得研究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和对“文化大革命”的“破”。“文化大革命”以急风暴雨之势顷刻之间酿成千万件冤假错案。而对“文化大革命”“破”了将近十年，“三案”至今尚未彻底平反。“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及其在政治、文化、精神、心理等方面造成的后果，是最大的精神污染，却可以逍遥于“清除”之外。邓小平同志再三指出，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如何“彻底否定”呢？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自不能运用被“文革”否定了的东西，而应该是“文革”感到恐惧却又否定不了（只好去打倒、迫害）的东西，这才是否定“文革”的真正力量。被“文革”打败而遭到否定的是包含着“左”的错误的“十七年”。“左”的病毒没有使它取得免疫力，却使它丧失了抵抗力，几乎是没有斗争就失败了。彻底否定“文革”的应该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真正结合，是在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没有这些彻底的“立”，就不可能对“文化大革命”彻底地否定或“破”。

为了“彻底否定”，决不能把“文化大革命”和我们捆在一起，认为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就是对我们的彻底否定。这种糊涂观念说明十年浩劫中破坏最大的恰恰是思想政治领域，一些我们从思想上心理上被俘虏了。仅仅宣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是不够的，还应理直气壮地肯定被“文革”戕害了的一切正确的有价值的东西。“文革”中的“反革命分子”，不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分子么？“文革”对人民的迫害是“错误的”，“文革”中受迫害的人“没

有罪”。如此而已吗？“天之未丧斯文也”，则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应在，真理的斗士应在。在于何方？否定罪恶滔天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有人那么心虚胆怯，唯恐挖了“文革”的祖坟，唯恐树立起人民斗争的形象？

“文化大革命”要“破”的，恰恰是和“文革”正相反对的力量。“文革”所以结束，是因为否定它的力量始终“立”在那里，发展壮大，直至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找不到彻底否定“文革”的力量，就不可能彻底否定它。

几乎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曲折。在东欧，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激荡最剧。事件过去十年后，匈牙利开始经济改革。付出的代价高昂，奋进得也高远。

“文化大革命”较匈牙利事件十倍为烈。发掘“文革”的经验教训较之发掘帝王陵墓重要万倍。把“文革”的反动力通过彻底否定转化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强大推动力，不仅党中央提出的宏伟目标定能提前实现，而且将使中华民族以共产主义的雄姿伟貌跃居世界历史的前列。历史的进步应与历史的代价相适应。

三、二律背反与不“立”不“破”

对一切片面的孤立的“真理”，二律背反表现得特别明显：一种事实和规律必有相反的事实和规律与之对应。

新生产力代替旧生产力，新生产关系代替旧生产关系，新理论代替旧理论，其共同特点却是不“立”不“破”。

用拖拉机代替牲畜耕地，不是宰掉牲畜，再买拖拉机，而是用拖拉机逐渐淘汰牲畜。甚至在拖拉机使用若干年后，还仍然保留着畜力，作为拖拉机的补充或备不时之需。只有一种新的生产力牢固地“立”起来之后，旧的生产力才能真正地“破”掉。

如上所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的胞胎里产生并成

熟之后，封建社会的灭亡才成为不可避免的。任何一种新社会的因素，都是在旧社会内部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小鸡必须先蛋壳里孵出来，蛋壳才会被啄破。诚然，不破坏旧事物的统治地位，就不能确立新事物的统治地位。但如果新事物尚未成熟和壮大到足以打破旧事物的统治并确立自己的统治，它又怎能取旧事物的地位而代之。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过程更是如此。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但是人们发现了这个矛盾，并不能发明出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案来。事物本身的矛盾产生着解决矛盾的因素。这却是只能发现不能发明的。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1卷第24章）

协作使生产力变为社会生产力，不是指作为商品的产品是供社会消费的，而是指生产力在其物质形态上和社会结合上具备了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对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则表现为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共同使用性质和股份制。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和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性质，孕育着崭新的生产方式，它们正是否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社会因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极重要的思想，就是确认共产主义因素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正因为共产主义因素是从资本主义产生出来的，正因为共产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立”了起来，资本主义的“破”，它的灭亡才成为不可避免的。

因此，人们建设社会主义，决不是从头脑中去“发明”社会主义的制度和特征，或者去构思社会主义的“蓝图”，而是从现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去发现共产主义因素，研究它发展的规律和

形式，促其实现。共产主义的“立”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破”，是现实事物发展之必然的表现形式。理论上认识上的“立”和“破”，则是这种客观过程的必然反映。

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每一阶段的过去和未来都是它本身的否定。因此在社会转变时期，仅仅强调否定是不够的，而应着眼于发展，即前进的否定。“文化大革命”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口号下导致了封建法西斯主义。想当然地以为“破”后“立”起的一定更进步，就难免要上“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当。天真的“囚犯”以为人家不让他继续坐牢便是放他回家，结果却被送上刑场。因此对于“破”，要弄清是什么在“破”；对于“立”，要弄清它要“破”什么，才能在“立”和“破”的统一中把握事物的运动和发展。

诚然，为了在旧基上建立新屋，必须先拆掉旧屋。但如果没有现成的屋子“立”在那里使人们先搬过去，拆掉旧屋人们将要受日晒雨淋之苦；如果没有建新屋的图纸、资金和材料“立”在那里，拆掉旧屋，人们得到的将只是一堆废墟。

四、经济改革的“立”与“破”

对唯物主义者来说，重要的不是“我要作什么”，而是在生活中不断地发现，知道“我应作什么”。不是规定别人“应该如何思想”，而是研究现实生活的发展如何改变着人们的观念。

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思想。社会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最基本的社会存在就是社会生产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

用思想（包括路线政策等）来解释历史事件最简便然而也最无用。不管这个“思想”属于一个伟大人物还是一种社会思潮。历史唯物主义要发现思想后面的经济事实。

我国从1957年至1976年的三次巨大社会动荡，从根本上